

民国时期广东的 对外经济关系

张晓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民国时期广东的
对外经济关系

张晓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广东的对外经济关系/张晓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97 - 2373 - 9

I. ①民… II. ①张… III. ①对外经济关系 - 经济史 - 研究 - 广东省 - 民国 IV. ①F752. 8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0186 号

民国时期广东的对外经济关系

著 者 / 张晓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王翠艳

项目统筹 / 梁艳玲 张晓莉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2.5


版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387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373 - 9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一 学界相关研究现状

民国时期广东（当时的疆界包括今广东省、海南省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沿海地带）商品经济较发达，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岭南特色浓郁，在诸多经济领域开了风气之先，这与频繁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学术界予以了一定的重视，专题性的著作在民国时期不多，主要有广州先导社编印的《九龙设关问题》（1934）、姚曾荫著《广东省的华侨汇款》（1943年编印）、陈达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等。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研究很少，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果迭出，有廖建祥等著《广东对外经济关系》、徐德志等著《广东对外经济贸易史》、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近代广州外贸研究》、陈柏坚主编《广州外贸两千年》、陈柏坚和黄启臣著《广州外贸史》、林家劲等著《近代广东侨汇研究》、梅伟强等主编《五邑华人华侨史》、刘权著《广东华侨华人史》、张朔人和于苏光著《华侨与海南社会发展》、黄启臣主编《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刘永连著《近代广东对外丝绸贸易研究》等，以及方志系列书籍如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汕头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编《汕头外经贸志》、九龙海关编志办公室编《九龙海关志》、黄埔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黄埔海关志》、广州海关编志办公室编《广州海关志》等。专题性的论文主要有范毅军的《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1861~1931）、连心豪的《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齐春风的《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袁丁的《1946~19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李芳清的《浅论近代珠江三角洲对外贸易的发展》、韩国姜玢亚的《1930年代广东地方关税和日本——以1935年的汕头事件为中心》、张小欣的《华洋之争与抗战前的广州煤油市场》、沈成飞的《金贵银贱下的广东国货运动》、邓正兵的《论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臧运祜的《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研究》、刘义章与肖自立的《“广州事件”与纳粹德国初期的对华政策》，等。

相关的论著在民国时期主要有邹琳著《粤鹺纪实》、广东省政府财政厅编《广东财政纪实》、刘懋初编《广东经济纪实》、符泽初著《广东粮荒与救济》、曾仲谋著《广东经济发展史》等。新中国建立后主要有林金枝著《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程浩编著《广州港史》（近代部分）、邓开颂等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美国李明珠著《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卢权等著《省港大罢工史》、邱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张晓辉著《香港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丁身尊主编《广东民国史》、张晓辉著《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黄增章著《民国广东商业史》等。^①

由上可知，迄今相关学术成果较集中于广东对外贸易、蚕丝外销、侨汇、华侨投资、涉外商业、航运、粤省政府与列强（尤其是抗战前与日德）之关系等方面，对于推动近代广东对外经济关系研究的继续深入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总体来讲涉及面不够广泛，亦未就整个民国时期作专题探讨，故研究领域及程度都存在局限。

二 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

1. 民国时期广东对外贸易的曲折轨迹

重点：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特点及其地位的变迁，各个时期外贸基本状况及商品结构的变化，生丝外销与洋米面输入的特殊意义，长期巨额外贸逆差的平衡支柱，走私与缉私的较量。着重剖析：对外贸易在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及其双重作用。

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众说纷纭，并最终形成了正统学派与激进学派的长期对立。正统学派认为，对外贸易是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激进学派则强调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使其“贸易条件恶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正统学派强调了积极的一面：通过对外贸易

^① 限于篇幅，其他相关论著不在此一一列举，可参见本书附录参考文献举要。

引起发达国家的商品、资本和技术向落后国家转移。激进学派则强调了消极的一面：发达国家以贸易为手段，牺牲落后国家的利益，导致国际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应该说，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的一面，也都有一定的片面性。^①

列强入侵引起岭南外贸口岸传统大格局的改变，造成各种不同性质和功能的外贸港埠。广东是民国时期全国进出口港埠最多的省份，沿海各通商口岸“群雄并起”，在新形成的外贸体系中发挥各自的作用。

对外贸易在南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广东的外贸总量仅次于上海，居国内第二位。外贸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十分复杂，尽管粤省对外贸易的结构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外贸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消极影响，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落后的地区产生了有益的作用。广东自古即处于对外开放之态势，尤其到了近代，国民经济外向型特点非常突出，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在社会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民国时期粤省出口商品有生丝、丝绸、抽纱、土布、针织品、火柴、蔗糖、罐头、糖果饼干、中西成药、皮革制品、电筒电池、锰钨铋矿砂、瓷器、爆竹、草席、蒲包、葵扇、纸伞及各种农副产品；需要输入的则有米谷、棉纱、染料、橡胶、皮革、机器设备、钢铁、煤、玻璃化砂、制皂碱类、印刷油墨、化妆品、火柴及电池等工业原料。

广东现代工业原料对外的需求率不算太高，产品销售亦主要靠内需，加以现代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因此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远不如传统贸易商品，如蚕丝、粮食等。

在民国时期各个不同的阶段，粤省的外贸状况及商品结构都有迥异的表现，尤其是洋货输入格局的变动、生丝外销的盛衰、洋米面的巨量输入等，都曾产生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规模走私贩私是广东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南粤走私几为全国之最，尤其自1930年代以降愈演愈烈，官、商竞相参与，至1940年代末，竟达于失控的局面。由于牵涉面相当复杂，遂有中英葡关于粤港澳边境缉私的艰难谈判。猖獗的走私虽给政府造成严重的税收损失，给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危害，但吊诡的是它对民生和民族工商业却又不无有益。如1940年代末，广州某工业界人士说：“当前政府对于输入限额之不切实际，如走私绝迹，国内大多数工厂均将因原料缺乏而不得已停工。现在一般工厂之所

^① 李一文：《近代中美贸易关系的经济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第5页。

以尚能继续开工，原料源源供应，全赖厂方能购得限额以外走私进口原料所致。”因此，“平心而论，走私输入，货物如属于生产器材，交通工具，工业原料及必需物资，对于工商业和民生方面也不无好处”。^①

2. 地方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度与管理

重点：历届政府的涉外财政收入，外贸统制，利用外资政策及措施，海关主权与关税自主，缉私机构的建立及加强。着重剖析：地方政府的外债及其用途，地方政府收回利权的举措，与外资合作的经验教训。

尽管对外贸易的地位极为重要，但中央及地方政府在对外经济管理上所发挥的作用有限，缺乏明确的外贸政策和制度，国门海关长期被外籍税务司所把持，1929年关税自主后形势虽有好转，而走私亦随之泛滥，使政府与海关的缉私工作不堪重负。政府的外贸统制乃一把双刃剑，后期的消极性远超其积极性。由于对国际市场的隔离与无知，外贸方式的落后，华商外贸组织的原始，使广东外贸的权柄始终操诸外国洋行。

地方政府的涉外财政收入主要限于各种专税和部分关税，为解决经费拮据的困境，历届财政当局均不遗余力地举借外债，但其性质及所起的作用却迥然相异。在利用外资与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地方政府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尤以陈济棠主政时的政绩最为典型。

3. 外国资本势力与广东社会经济

重点：分布于粤省的外资企业，各国洋行控制广东外贸，洋商大公司的华南销售网，列强对铁路修筑的觊觎，租界及租借地经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殖民地经济，港币在粤之特殊地位，战后国统区美货泛滥。着重剖析：不同时期列强势力在粤的消长，外国资本在广东的多种形态、扩张方式及其历史作用。

民国时期，外国资本加紧对广东进行经济扩张，各类洋行纷纷设立，特别是世界性的托拉斯组织构建了遍及城乡的销售网络。外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尤其是港币在粤的大量流通，操纵并扰乱了全省金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洋行的业务趋于萎缩，而美国资本则趁势扩大了在粤的投资范围。

外国资本在粤存在博弈，如抗战以前，广东主要归于英国的经济势力范围，英商以香港和广州沙面英租界为基地，对华南进行经济辐射，实力雄厚的怡和、太古洋行、汇丰银行等，不仅操纵广东的对外贸易，还控制了广九

^① 黄增章：《民国广东商业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383页。

铁路和岭南沿海及内河航运。法国占有广州湾租借地及广州沙面法租界，其势力范围主要限于粤西沿海一带。德国以商品输出和获取原料为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非常活跃，但其作用相对有限。日本趁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独自发动侵华战争之机，排挤西方各国在粤洋行，对沦陷区进行疯狂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和掠夺资源，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阴谋。美国则始终是以商品倾销为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居于中外经济关系之主角。各国货物在广东同样也存在较量，如1930年代以前，广州外贸进口货物以棉纱、粮食等为主，洋纱有印度纱和日本纱两种，1920年以前印纱最多，但此后日纱输入已远超印纱。^①省港大罢工时期，洋货尤其是英货受到强烈抵制，广东革命政府实行联俄政策，给苏联商品提供了有利的销售机会，据廖仲恺在1925年8月8日省港罢工工人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讲，现苏俄每周有轮船六七艘到广东。^②但在贸易场上，一般来讲商品质量还是起决定作用的。据海关华洋贸易报告记载，1927年广州港美制煤油输入大增，因煤油捐减征，且俄油质劣，不能与之相抗争。^③此外，各洋行为了垄断市场，常常钩心斗角，以致“大鱼吃小鱼”，如鹰牌小寿星炼乳在广州初由一些小洋行代理经销，至货品畅销后，即被大洋行吃掉。至于抢购当地原料或别国货源，小洋行就更难以与财力雄厚的集团硬碰。^④

频仍而大规模的战乱是广东社会发展的主要破坏因素，民国初期10余年间军阀割据，战乱不断，1930年代末至整个1940年代全省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来讲呈下降状态，其根源即在于日本入侵和全面内战。如此长期战乱恶性循环，社会正当经营难以开展，不仅国人和华侨视投资实业为畏途，连外国资本亦不愿问津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较多而收效慢的项目。当时外国投资主要集中于洋行及航运，以垄断广东的对外贸易，并未像在沪、津、青岛等城市那样大量创办、经营实业。实际上，驻粤外商机构的生长也相对缓慢，民国初期10年间，广州外商企业数在全国的位次从第7位落到第9位，甚至还不如内地的汉口等城市。

① 武育幹编《中国国际贸易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第411页。

② 尚明轩、余炎光编《双清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881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关总署办公厅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02册，京华出版社，2001，第76页。

④ 冯维标：《省港各洋行杂记》，《广州文史资料》第35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106页。

外国资本和华侨资本是广东近代社会经济不可忽视的两大制约力量之一，应理性地评析外国资本及投资的双重作用，从主观上讲是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主要带有侵略性和掠夺性，但从客观效果上讲却有一定积极性，尤其是表现在其企业管理、制度及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先进性，中外合作、激活市场、增多就业职位及机会等，推动了广东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顺应了近代化的进程。

4. 外向性的经济生产门类

重点：具有岭南特色的出口型农业种植模式，手工业及矿业出口关联生产。着重剖析：国际贸易导向下的农业生产结构变化，化肥与农药的引进，新兴工矿业的发展态势，农牧渔工矿各重要行业企业的生产及产品外销状况。

广东经济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生产发展由此形成新的格局，科技新产品对传统行业具有双重影响。如在农业生产领域，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不能平衡发展。早在清代，广东已出现各种经济作物种植的专业化地区，即使农作物种植尚未专业化的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十分普遍，挤占了不少农田。进入民国后，广东经济作物挤占农田的现象进一步发展，如蚕桑、甘蔗、烟草、水果、花生、茶、麻、蒲葵、瓜类蔬菜、花卉、油桐、树胶、咖啡等，都形成了一些集中专业产区，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继续下降。由于外国资本侵略范围的扩大，广东农村经济同资本主义国际市场的联系加深，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在外贸出口需求的驱动下，农民不断追逐效益较高的种植门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纺织业原料奇缺，丝价暴涨，珠江三角洲蚕丝业进入鼎盛期，出现“一船蚕丝去，一船白银归”的局面。潮汕地区许多田地经过废稻种蔗后，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种植水果及花生潮流。在海南岛，橡胶、咖啡、槟榔、胡麻等亚热带经济作物，得到了广泛的种植。

5. 华洋产品的市场竞争与共生

重点：民族工商业的竞争方法与手段，土货在竞争中的成效，华洋货品市场共生的原因；着重剖析：土货与洋货竞争的不平等因素，华洋产品的市场切割及消长规律，两者的相互制约与市场互补。

民国时期，华洋产品在广东市场的竞争是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土货商虽然受到外国资本和洋货的高压，但仍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历次抵制洋货运动的有利形势，以各种方法和手段进行顽强地抗争，包括：仿制洋货和改造

创新、引进和采用机器生产、改进和提高产品质量、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加强同业的联合与合作、政府采取保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改进外贸方式等。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虽然从总体上讲洋货占有上风，但并不是在任何时候和所有行业都是如此，甚至同一地方在同一时期背景下，各行业的境遇也不一样。土货销售时因诸多因素甚至不亚于舶来品，如1933年广州进口洋货锐减，匹头因5月以后进口税率增高，受到严重打击，不克与国内产品争衡；进口煤油因本地炼油工业勃兴，洋水泥因本埠新设水泥厂产品之排挤和进口税率激增1倍而陷于不振；新加坡橡胶制品，几被本地产品逐于市场之外。“其他各项洋货，无一不因进口税率增加，及本埠通货跌价，而蒙挫折焉。惟出口土货，则因海外需要趋殷，而见畅旺”，如钨砂、烟叶、烟丝、草席、纸伞等。^① 1934年九龙海关直接进口货物大降，尤以洋米和煤油为甚，进口洋米由1933年530万公担减至270万公担，煤油由1932年的4540万公升减至仅20万公升。因两广当局征收煤油特税，又提升海关税率，使内地炼油业得到双重保护，益趋蓬勃。^② 1936年粤海关直接进口洋货萎缩而进口土货激增，“按自国内实业逐渐发展以来，本埠进口之制成品，即已受有影响，本年则此项情形，尤为显著，盖以土货品质，益见改善所致”。^③

此外，华洋产品亦非只有竞争，在不少方面，两者甚至还存在着相互依赖或促进的互补性，形成一种经济共生关系。土货与洋货市场共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洋货具有较强的市场需求及竞争力，民族工业的外销及市场竞争力较弱，华洋货品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分工，国外市场需求带动产业的发展，洋货输入受到一定的制约以及民族工商业对外的依赖性。这种依存“共生”过程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尽管依存“共生”关系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但对于在华外资企业的发展显然更为有利。

进出口货物对广东市场的分割是随着时期的转移、形势的变化和社会需求的增减而互呈消长。总的来讲，一方面，民国以降，洋布、洋纱、化肥、洋纸、颜料、汽油、柴油、煤油、煤炭、火柴、海产品及许多日常用品充斥粤省市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由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国货通过激烈竞争，渐将洋糖、日台煤炭、水泥、胶鞋及化妆品等舶来品逐出内地市场；另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4册，第159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6册，第182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20册，第349页。

一方面，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是1930年代初，经广东经济建设高潮，需要进口大批工业原材料及设备，故输入汽车、机车车辆、船舶、飞机、钢铁、五金、电器、机器、通信器材及煤炭、燃油等激增，有利于全省现代工业、公路、铁路、航运、航空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的发展建设。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竞争必不可免，它从根本上是企业生存并发展的动力。近代广东的外资企业较少，这固然减少了列强经济侵略的压力，但也会使民族工业缺乏竞争环境及洋商企业在先进的管理、技术、设备、产品工艺等方面的示范，因而发展水平和速度并未领先于沿海其他省区。

粤商广泛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是无可争议的，问题在于其所处的消极被动境地，只能成为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附庸，这从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大体上讲，粤省出口以农副产品及自然特产为主，手工业制品次之；进口则以原料、燃料、各种消费品及资本货物为多。如抗战前输出货物以生丝居首位，其次为矿砂、五金、绸缎、菜蔬、针织品、草席等；战后输出货物以桐油居首位，其次为矿砂、五金、鲜干果、木藤竹器、针织品、土纸、菜蔬、药材等。抗战前输入货物中，谷米常居首位，其次为矿物、五金、矿物油、化学品、西药等；战后输入货物以矿物油及化学品占最主要地位，其次为洋纸、五金、钢铁、棉花等。^① 广东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入超状态，对于省内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不言自明。此外，进出口贸易的不平衡状态，实潜伏着严重弊端，如出口货品集中于少数特产，其销场可能因其他国家的生产或替代品而受影响；出口货品以原料品占主要部分，往往于出口后，经进口国或地区加工制造后复输入省内销售；出口货品的质量不一，在洋货的竞争之下，销售日渐萎缩，丝、茶等项即为最显著的实例。就进口而言，广东市场日益沦为外国商品的倾销地，越往后期，省内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越严重，如1949年广州不仅工厂所需的机器设备、化工原料，甚至连稻米、棉花、烟叶等农产品原料也得从国外输入，这充分暴露出产业的危机。^②

出现上述问题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因素，即当时一般民众对外意识的保守性和落后性。1934年7月，陈济棠作《心理改造》一文，对“国民心理

① 连璧：《华南贸易的新页》，《经济导报》第144期，1949年10月25日，第8页。

② 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编《光辉的十年——广州市解放十年来的伟大成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第37页。

病态”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剖析。他批评农界的“守常”病态，谓“中国农民最普遍而又最重要的心理病态，便是固守成法不求进步”。“今日外国科学输入，习外国农科的人亦日多。但我们应该一面研究，一面实习采人之长，补我之短。切不可死守旧法，故步自封，甘心落后”。又批评工界的“因循”病态，谓强国“都藉着优越的生产能力，向经济落后的国家肆其侵略。因此我国便成了万国渔利之窠，做他们销售生产品的尾闾”。而工界普遍的心理是“大都不知技术的进步是没有止境的，泥守古法，不求改善，先民对于工业研究和创造的精神，久之遂完全湮没了”。他希望工界“及早把先民研究和创造的精神恢复起来，迎头赶上欧美各国的生产事业，来解决今日国民经济破产的危局”。陈氏批评商界的“诈伪”心理病态，说信用为经营商业的要素，“可是世风日下，其中不肖的人，每好施用种种诈伪手段，希图获利于一时。如劣品诈称佳品，赚钱伪称亏本，或装潢门面以炫人，或改头换面以欺众之类，种种色色，不一而足。又如不依约定日期交货，或交货而变更质量款式，等等，亦为近日商场中惯见的事实。其甚者，更假冒或影射别家商标，甘于触犯刑章而不恤。影响所及，大之足以妨碍一国商业的进步，小之亦心劳日拙，足使自己营业的命运陷于绝境。例如茶丝两者，向为我国出口大宗，近年已一败涂地了。考其失败原因，虽甚复杂，最重要的便是商人贪图赢利，掺杂低劣品质，引起外人的歧视”。他同时还批评了商人在对外贸易中的“暗昧”，说“商人对外贸易，必须洞明国际的情况，研究各地市场的需要和社会的心理，随时注意各种统计，才能操奇计赢，推销获利。试看外人运销内地的货物，怎样的适应我们日用的需要？怎样的迎合我们社会的心理？有时还利用倾销的政策来推广销路；又利用托拉斯和卡台尔种种组织，减少国内的商业竞争，来共同发展国外贸易。手段又何等灵敏？意志又何等团结？企图又何等伟大？返观我国商场的情状，输出货物，数十年来老是一般的种类花样，不知改良，不知创新。方当商战时期，似此笨拙，何能与人争胜？最近并连丝茶大宗生意的市场，也被人掺夺到一蹶不振了。而同业间又只守着几条旧有的行规，对于联合对外的大组织大计划，完全未曾梦见。盲行摸索，涣如散沙。其尤甚者，则同行如敌国，自溃商战的阵线，说来真是可痛。切望我们商界同志一致奋起，研究现代商业智识来发展一切贸易，以免终为时代的落伍者”。^①

^① 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1928~1936），1985年编印，第245~250页。

6. 粤港澳及海外华侨的经济联系

重点：广东政府吸引港澳及华侨资本的政策，粤港澳密切的经济共生关系，华侨投资与广东的经济增长。着重剖析：粤商对港澳及海外市场的展拓，华侨及港商对广东的投资，以香港为枢纽的华人跨国商贸圈及其作用。

华侨资本（含实业投资和侨汇）是广东近代经济的特征之一，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极为显著。华侨为粤省的近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金，他们所创办的企业或行业，有不少是居省内甚至全国首创地位的，如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佛山巧明火柴厂）、第一家电灯公司（广州电灯公司）、第一家橡胶厂（广东兄弟树胶公司）、第一家飞机装配厂、最早的民办铁路（新宁铁路和潮汕铁路）等。广东首家华商进出口商行、首批橡胶园、首家公共汽车公司、最早最著名的几大百货公司等，也都是由侨资创办的。华侨率先在粤投资创办了众多的企业，并从海外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企业制度和经营理念，对于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粤籍华侨人口众多，对外联系的广泛和密切，使广东商业尤具外向性，这在沿海各通商口岸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是内商与外贸兼营，采用近代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了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但大量华侨地主的出现对农村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消极影响，侨汇历来是促进粤省地价上升、加速地权集中的一个因素。在沿海及梅县等华侨较多的区域，因海外经商回国购地而成为地主者非常多，甚至有些人尚未归国，却早已通过多种途径在家乡谋得了地产。抗战后侨乡的地权更为集中，战乱促使人民必将侨汇购地，以变成永久性资产。^①

粤商以经营进出口者甚多，与海外及港澳联系密切。民国时期，粤港澳人员交流频繁，港澳同胞回乡集资发展实业，对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粤商对于香港的开拓，也是显著的事实。粤港工商界血脉与共、全面协作、相互提携，特别是创建了一大批颇具实力的联号企业，这是海内外华资交融的高级形式，在我国近代民族经济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密切的对外关系使粤商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如据1948年估计，

^① 薛暮桥、冯和法编《〈中国农村〉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第823页。

广州商行中外省商帮占一半，洋商占 30%，本地势力只占 20%。^① 兼有粤商、侨商及港商身份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如据 1934 年越南中华总商会呈中国政府外交部文称，在越华侨人数尚无精确统计，一般推测为 40 余万人，可分为广州帮、客家帮、福建帮、潮州帮及海南帮等 5 大帮。其中广州帮人数最多，大都从事工商业。客家帮以茶商居多。潮州帮职业多系船夫和挑夫。海南帮多从事垦殖业。闽帮人数较少。^② 新加坡华侨经营香汕郊商业者，当首推广、潮两帮，已有近百年历史。在抗战前全盛时，有“头盘商”60 家左右（潮帮 30 余家，广帮 20 余家），“二盘商”成百家。日占时期，新加坡香汕郊全部停顿，战后又相继复业，大量运销潮汕土货于市，商家趁物资匮乏之机，操纵市场，抬高售价，以赚取厚利（但 1946 年初，因马来亚居民购买力下降，物价连跌，而运货成本已达最高峰，新加坡香汕郊商家损失惨重，许多投机商破产倒闭，潮汕的对外贸易必然也受到严重影响）。^③

7. 对外关系影响下的经济社会

重点：粤籍人口的国际迁移及其根本原因，粤商组织与对外经济关系，对外贸易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日本军事入侵造成的严重破坏，社会游资的大量外流。着重剖析：城乡民众生活的变化和通商口岸的城市近代化。

对外经济牵涉国内外两种性质迥异的资本形态和两大市场，而国际市场和外国资本均居于主导地位，广东经济的命运与世界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如农作物中最重要的应是粮食，但利润不高的粮食作物却受到轻视，广东粮食生产不敷需求的情况日益严重，结果连许多农民也不得不靠购粮维生。据 1937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全国各省购买粮食农家百分比平均为 3.5%，而广东以 47.6% 高居榜首，比名列第 2 位的江苏省高出 7 个百分点。^④ 关于粮食生产问题，针对本省“桑田日辟，禾田日增”的现象，早在 1919 年时已有人发出警告：“设彼有水旱兵灾之忧，而此即有粮食告罄之惧。”^⑤ 尽管

① 广东省档案馆等编《东江革命根据地财政税收史料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第 174 页。

② 田永秀编译《法国在华经济势力之全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第 322 页。

③ 吴斯柳：《新加坡的香汕郊》，1946 年 5 月 25 日香港《华商报》，第 2 页。

④ 《国内劳工消息·经济状况》，《国际劳工通讯》第 4 卷第 12 期，1937 年 12 月。

⑤ 章有义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2 辑，三联书店，1957，第 212 页。

粮食生产形势日趋严峻，但仍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甚至盲目乐观，认为“广东粮食问题真正的生路，不是直接地生产粮食，而是间接地换取粮食”^①。事实上，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不能同步发展而农业生产失去平衡，其后果必然是灾难性的。在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广东农业，经济作物的发展以出口为导向，受国际市场的制约，具有很大的风险性。1930年代初蚕丝业的一蹶不振使广东农村经济危机加重，全省对外贸易的支柱倾斜；^②另一方面，粮食生产长期停滞不前，每年需从国外输入大量粮食。这种情况在民国时期最为突出，每遇战乱荒歉，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甚至发生人吃人之惨状。

粤省经济的对外开放性和依赖性都很高，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社会经济的对外依赖性，使其极易遭受国际性不景气的风险，某些重要的行业甚至惨遭打击。如1932年，由于银价猛跌及进口税率提升，洋货滞销，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各国贸易凋零，市场萎靡，关税壁垒森严，土货亦难以外销；南洋各地严限移民入境，并遣返华工，本年由南洋返回汕头14.1万人，而出国仅7.6万人；广东各侨乡侨汇大减，社会购买力愈趋缩瑟；加以内地苛捐杂税繁重，剧烈地抵制日货运动等因素影响，使得经济状况严重恶化。^③但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对外开放性，又有利于得到外部世界活跃经济因素的刺激，在诸多领域里得开风气之先。如外资企业客观上为粤民从事近现代经济活动起了示范和带动作用；海外侨胞回乡投资企业，使广东的民族工商业日益繁盛。粤省许多企业直接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模式，故一开始便有了较高的起点。广东是我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在此阐发了他的民生主义思想，商民的近代经济观念也因之较内地先行了一步。

民国前期是南粤近代城市建设发展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外贸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尤不可忽视，学术界有关近现代中国或广东对外贸易的论著一般都涉及通商口岸外贸的内容，但本书并非单纯研究外贸，而是以广东重要商埠为个案，考察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外贸对近现代中国通商口岸乃至区域社会经济的实际影响。广州、汕头等素以对外贸易兴市，由此进行生产要素的

① 杨开道：《广东经济问题解剖》，《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2期，1943年6月。

② 参见张晓辉《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12册，第175~176页。

转换，实现经济循环。外贸与各埠市场开放、近代化生产、城市建设、市民生活等均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产生了两面性的影响，洋行既控制了通商口岸的外贸，对当地建设亦有推动。舶来品虽冲击了传统市场，但与国货生产并未脱离竞合的关系，并引领了市民的生活时尚。

毋庸置疑的是，受半殖民地对外关系的消极影响，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格局极不平衡，潜伏着重重危机。在珠江三角洲及沿海地带，农村自然经济解体进程较早较快，而粤北腹地及海南岛地区，则很少有变化。虽然经济作物发展较快，但农村饱受外国资本和本省封建势力摧残，粮食生产严重萎缩。

粤省手工业生产历史悠久，工场发展水平较高，舶来品所产生的冲击不平衡，不同土货受影响的程度不尽一致。如榨油、碾米、制盐、中药、砖瓦、粗制农具、酱油、日用竹木器等，很少直接受洋货竞争。但不少重要部门在洋货倾销的打击下，经营十分困难。如冶铁业曾是广东手工业的骄傲，在清末民初洋铁的冲击下，解体乃至湮没无闻；土布业和染织业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后亦陷入困境。

近代工矿业虽然起步较早，但民国以后发展曲折，隐患很多。首先，地区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90%以上的企业集中于广州及其沿海地区的佛山、汕头、湛江等少数城市。而广大山区，特别是粤北和海南岛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没有或很少有近代工业。这种情况，一则使工业生产与原料、燃料产地及消费地区严重脱节，加重了有限的运输线路的负担；二则使北部山区及海南岛的各种丰富资源得不到开发和利用，贫困面貌难以改善。粤省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畸形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其次，自身缺乏强大的动力，需要外力的牵引，如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导向，或由海外华侨的投资带动（广东近代工矿企业大多接受华侨投资或其本身就是侨办企业）。近代工矿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远逊于商业，正如叶剑英所指出：“广东的城市一般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又比其他城市更带有半殖民地的特征。”^①

在商业方面，由于粤省所产日用品不能自给自足，而购买力却高于他省（主要原因在于侨汇较丰），须舶来品补之，故造成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对外贸易逐年入超，输出多为原料品或手工业、农副产品，输入多为工业制

^① 《广东省工作报告》（1950年6月27日），《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第222页。

成品。贸易方式，在输出方面，是直接售与办庄或洋行；在输入方面，是直接向洋行订购或向办庄、洋行买入，均以间接与国际贸易居多，故粤省商业“完全赋有为洋行尾间的特质”，^①此乃广东半殖民地性外贸的一个显著特征。

商业气氛过浓，过于依赖侨汇，对产业资本的发展有着负面影响。在乡村地主中也有不少人兼有商人或归国华侨身份，地主经商和放高利贷的风气很盛，所占比例远较北方各省为高。^②但广东商埠的发展并不平衡，在腹地各县市，基本上仍沿袭传统的经营方式，因而与沿海开放地区对照形成巨大的反差。新式商人大都以经营舶来品为主，专业批发分工很细，与洋行关系密切。到民国中后期，无论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经营的投机性都极重，使本省社会间接基础异常脆弱。

8. 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

重点：广东革命政府夺取关余和盐税的斗争，历次抵制洋货与提倡国货运动，中央及地方政府对民族产业的扶植，省港大罢工对英国的沉重打击，抗战时期的对敌经济反封锁，战后对日伪企业的接收。着重剖析：抵抗列强经济侵略运动的发展特点，抵制洋货的成效及有限性，抵货运动中的特殊层——商界。

自进入民国后，国民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抵制洋货被视作经济领域的重要斗争武器，因而抵货运动接连不断，尤其是省港大罢工抵制英货和多次抵制日货运动，沉重打击了英日帝国主义。但对抵货运动的功能不宜过于拔高，对此时人已有认识，指出对外经济绝交，不足以制敌于死命，只是一种消极的办法，必须积极地振兴实业。

民国肇始，随着民族资本的迅速崛起和国人国货意识的不断增强，国货运动得以发端。1930年代初的国内外形势，更催化了规模宏大的国货运动。尽管运动轰轰烈烈，但由于政府言行不一、商人投机，特别是国货存在质量问题等因素，致效果不彰。

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发展受到外国资本的压抑和摧残，故能积极支持和参加反帝爱国斗争，然而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又使得其进退维谷。但凡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重大事件中，商界常遇“爱国”与“私利”问题之尴尬。

^① 曾仲谋：《广东经济发展史》，广东省银行1942年编印，第181页。

^② 《陈翰笙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第138页。